

文学馆

林贤治 主编

Camus's
works



孤独、团结与反抗

加缪作品选

[法] 阿尔贝·加缪 著

郭宏安 译

Albert Camus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林贤治 主编

Camus's
works

孤独、团结与反抗

加缪作品选

[法] 阿尔贝·加缪 著
郭宏安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孤独、团结与反抗：加缪作品选 / (法) 加缪著；
郭宏安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11

(文学馆 / 林贤治主编)

ISBN 978-7-5360-7206-0

I. ①孤… II. ①加… ②郭… III. ①小说集—法国—现代②散文集—法国—现代③演讲—法国—现代—选集
IV. ①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7006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秦爱珍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
- | | |
|------|---|
| 书 名 | 孤独、团结与反抗：加缪作品选
GUDU TUANJIE YU FANKANG; JIAMIU ZUOPIN XUA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13.25 1插页 |
| 字 数 | 270,000字 |
| 版 次 |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册 |
| 定 价 | 43.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作为出版者和成名作家的加缪。摄影师卡提耶-布莱松，马涅姆
图片摄影报道事务所的创始人，抓住了阿尔贝·加缪鲜活的瞬间

代译序：阿尔贝·加缪

郭宏安

阿尔贝·加缪去世已经五十年了，然而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依然活在法国人的心中。他是否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我不敢说，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必要全面地了解、全面地认识他的作品及他这个人。这里所谓“活”，是说普通的法国人一直喜欢加缪这个人，阅读他的作品，而在法国知识界，加缪却一直受到质疑，甚至嘲讽和攻击，他被轻蔑地称为“正义者加缪”。直到1978年，有人（让·达尼埃尔）指出，在法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向加缪回归”的现象，加缪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法国亚眠大学教授雅克丽娜·莱维-瓦朗齐在1999年10月号的《欧罗巴》杂志上说：“他的年轻的读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敏锐地感觉到一种没有谎言、没有幻觉的人道主义，感觉到他的苛求的良心和他对绝对的教条及狂热的理论的拒绝；他们感谢他不顾一切地坚持幸福的追求，不顾一切地为人的某种纯洁、为一个团结的世界辩护；

由此感谢他帮助他们生活下去。”这番话对于经历过20世纪的人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流行存在主义，这是一种“实质上不能加以系统的说明”（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的哲学，它之所以流行，不过是因为萨特的几句话，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话语，例如“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注定是自由的”、“他人是地狱”、“人之初是虚无”、“自由选择”、“人生是荒诞的”等等。所以，要谈加缪，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加缪是不是存在主义者，他若不是，他是哪一种哲学的信奉者。

2 加缪说过：“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总是惊奇地看到我们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我们甚至想有朝一日发个小小的启事，具名者声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担保相互间没有受到影响。这是笑谈。我们各自写的书，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的论文，《西绪福斯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此话是加缪在1945年11月15日说的。众所周知，正是从1945年开始，存在主义风靡法国，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间蔚为时尚。

长期以来，尽管加缪自己多次否认，萨特也未曾首肯，他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直到1951年，他发表了《反抗的人》（L'Homme révolté），与萨特展开了一场

为时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之决裂，这才使法国的一些批评家如梦方醒，看出了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加缪的哲学于是被承认为“荒诞哲学”（关于荒诞的哲学），一顶存在主义者的帽子也被摘去了。但是，在英、美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中，甚至在法国，加缪继续被一些人视为存在主义者，或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右翼代表人物，例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就说：“加缪代表着成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他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诞，来概括人在宇宙中处境的特征。”

阿尔贝·加缪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作家，主要的根据是他的两部作品：中篇小说《局外人》（*L'Étranger*, 1942）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 1942）。关于这个中篇小说（最初作者称《局外人》为“故事”，译成中文仅五万字，在法国却被认为是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法国人不以长短论小说），加缪曾经说过，他在其中要表现的是“面对荒诞的赤裸裸的人”，而哲学随笔的副题则是《论荒诞》。早在1938年，萨特发表了《恶心》（*La Nausée*），把恶心当作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性的一种觉醒的表现。《恶心》在前，《局外人》在后，都是轰动一时的作品，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拈出了“荒诞”二字作为它们共同的主题，加缪也就被归入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派中去了。实际上，荒诞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很多，而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却是不尽相同的。远的不说，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萨特、加缪都

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却未见有人把马尔罗和萨特连在一起，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说到联系，加缪距离马尔罗恐怕要比距离萨特还要近一些。确认加缪与萨特从同一点出发伊始即分道扬镳这一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有的批评家才把后来出版的《鼠疫》（*La Peste*, 1947）看作是对《局外人》的否定，作为加缪思想出现转折的证明，而实际上，这两部小说是一脉相承的，是加缪的思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没有超出他关于荒诞的理论的范围。同样的道理，加缪后来发表的《反抗的人》，也并不是对《鼠疫》的反动，是什么真实面目的“大暴露”，而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这三部对加缪的创作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它们之间只有阶段的不同，并没有方向上的差异。

要确定加缪是否存在主义者，或者说，要证明加缪不是存在主义者，必须了解他的“荒诞哲学”，要了解他的荒诞哲学，必须考察他的各时期的主要作品，为此，不能不涉及他的生平，因为加缪是一位人品和作品非常一致的作家。萨特在《答加缪书》（1952）中说：“对我们来说，您曾经是——明天您仍可能是——人格、行动和作品的令人钦佩的结合。”中国人说，“修辞立其诚”，加缪的作品是诚实的作品。

阿尔贝·加缪于1913年11月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蒙多维镇，其家祖籍法国阿尔萨斯。他的父亲是个农业工

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在马恩河战役中身负重伤，不久死去，其时加缪还不到一岁，他说：“同所有我这个年龄的人一样，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从此我们的历史一直是杀人的，不公正的，或者充满暴力的。”（《夏天集·谜》，L' Enigme, 1954）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去世后，即举家迁往阿尔及尔，住进一个贫民区。母亲在一家弹药厂做工，还得帮助别人做家务，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贫困。加缪后来说：“我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学到自由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的。”（《时文集》I，Actuelles I）他在一位教师的帮助下，考取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又靠勤工俭学，进了阿尔及尔大学。他当过气象员，商号的雇员，政府机关的职员等。他知道生活的艰难和穷人命运的不合理，但他从不抱怨，而是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阳光和海水。他喜欢游泳，当过大学足球队的门员，他的格言是：“要紧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西绪福斯神话》）不幸的是，他十七岁上得了肺结核，当时，肺结核几乎就等于不治之症，这在他的精神上投下了终生不能抹去的阴影。他在大学主修的是哲学，深受他的老师，哲学家让·格勒尼埃（Jean Grenier）的怀疑论的影响。1933年，希特勒上台，加缪很快就投身于巴比塞和罗曼·罗兰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1934年底，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其任务是在穆斯林中间开展宣传工作。1935年5月法国外长赖伐尔访苏，“斯大林-赖伐尔协定”使法共改变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政策，由支持改变为反对，即反对法西斯主义优先于反对殖民主义，加缪作为“托

派分子”被开除出党，一说是他主动退出共产党，但他在共产党控制的“文化之家”一直工作到1937年。这期间，他组建了“劳动剧团”，免费为劳动群众演出，他并与人合作，写了以反暴政为内容的剧本《阿斯杜里起义》（Révolte dans les Asturies, 1936），遭到禁演。他还参加了阿尔及尔电台的剧团，经常到城乡各地去演出。1936年，他完成毕业论文，内容是比较普洛丁和圣奥古斯丁著作中的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论文的题目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未能参加教师衔级的考试，在大学中执教的希望破灭了。1937年，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国知识分子创办了《阿尔及尔共和报》，加缪当了该报的记者，负责文艺评论，但他的活动很快就扩大到了政治方面，写了不少文章抨击政府和法律的不公，揭露居于少数的欧洲人对当地阿拉伯人的歧视和压迫等不合理现象。同年5月，他出版了散文集《反与正》（L'Envers et L'Endroit），追述了童年的生活，处处显露出贫穷和欢乐的对立，这种对立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基本源泉。1938年萨特的小说《恶心》发表后，他立刻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批评作者过分地强调了人的丑恶而忽视了人的“某些伟大之处”。次年，他发表了《婚礼集》（Noces），以浓郁的抒情笔调，讴歌了人与大自然的结合，说：“除了阳光，亲吻和野性的香味以外，一切对我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生活不止于阳光和大海，加缪怀着深厚的同情，前往阿尔及利亚北部山区卡比里进行调查，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篇报道，揭露了当地少数民族极其悲惨的生活状况，试图引起法国政府的注意，改

变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加缪对阿尔及利亚和它的原住民有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情怀，这是他长久不能释怀的心结，这也是他至死都不能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加缪担任了新创办的《共和晚报》的主编。他严厉地批评法国总理达拉第的政策，他在批评苏联破坏波兰和芬兰领土完整的同时，也反对某些人的反苏偏见和取消法国共产党的叫嚣。他曾经想参加军队，因健康的原因而被拒绝，但他对大战的态度是明确的，认为是反动派之间的战争。他说：“第一件事是不绝望。不要过多地听信那些高喊世界末日的人。”（《巴旦杏树》，Amandiers, 1940）“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手记》，Carnets, 1962）加缪不肯屈服于新闻检查，触怒了当局，1940年1月，《共和晚报》被封，加缪遂经人介绍进入《巴黎晚报》，离开阿尔及利亚，到了法国本土。《巴黎晚报》是一份右派报纸，其政治观点为加缪所不齿，他只肯担任行政秘书一类纯技术性的工作，空余时间就加工润色他的小说《局外人》，同时为《光明》（La Lumi-ère）等左派刊物撰稿。《巴黎晚报》很快堕落为合作报纸，加缪再度失业。此后的两年中，他回到奥兰，全力以赴进行创作，他完成了《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和剧本《卡利古拉》（Caligula），并开始酝酿《鼠疫》。他同时在一家私人学校任教，教授被维希政府排斥于教育之外的犹太儿童，并建立了一个组织，帮助犹太人在突尼斯安顿下来。1941年12月15日，法共党员加布里埃尔·贝里被德

国法西斯枪杀，其时加缪正在法国养病，他看到这个消息，立刻决定参加抵抗运动，他说：“我一直觉得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我憎恨暴力，但我更憎恨暴力的机构。”（《时文集》I）他参加了北方解放运动的组织，组织的名字叫“战斗”，担负情报和地下报纸的工作。1942年和1943年，《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相继出版，立刻评论蜂起，一片赞扬声，娜塔丽·萨罗特说：“当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出版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将满足所有的希望：如同一切真实的作品一样，正符合了我们的希望。”（《怀疑的时代》，1956）

《局外人》的构思始于1937年，经过三年的酝酿，大概在1940年写成。小说篇幅不长，首先以简练得近乎枯涩的笔调，冷静得近乎淡漠的口吻，震动了读书界。评论家一致承认，小说的作者是一位古典主义的大手笔，是一位完全成熟的作家。至于小说的内容，几十年来，对其含义的挖掘似乎还没有穷尽。最有影响的，仍然是萨特的解释，他认为小说是“荒诞的证明”，是对资产阶级法律的抨击。小说是以阿尔及尔一家船运公司的职员默而索的自述形式写成的，他像讲别人的事情一样，以极冷静的口吻讲述自己过着单调的生活，母亲的死并未带来任何变化，直到一连串偶然的事件使他无意中叩响了不幸的大门：他成了杀人犯，被法庭判了死刑，就在临刑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领悟到生命的可贵，依恋之情油然而生。默而索是个很复杂的人物，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个接近自然状态的人，他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

上班、游泳、交友、看电影。但是，他内心中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错了，他有两句口头禅，一是“无所谓”，二是“这不怪我”。他的这种感觉来源于人与社会的对立。默而索只在大自然中才感到舒服，与社会却格格不入，他最后被判处死刑，并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社会的习俗：例如，他没有哭死去的母亲，对婚姻、对事业上的升迁了无兴趣，对法庭上的辩论也漠然置之，总之，他是因为对社会表示冷淡而被视为社会的敌人。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指出：“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他甚至说，默而索是人类唯一配有的基督。这话的确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但它的意义是明了的，基督为了人类的苦难而死，默而索是因为不适应社会生活，因为不尊重约定的观念而被社会判处死刑的，他承担了人类的命运，为了非人的生活环境而死，此非基督而谁？默而索是诚实的，他不说谎，不想像别人那样在社会这个舞台上演戏。《局外人》的主题是人类与其生存条件的不协调，这个条件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社会。加缪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这与小说用形象反映出来的思想是一致的。认识到两者的对立，就是认识到了荒诞，默而索的觉醒是从他打死阿拉伯人，叩响不幸的大门时开始的。对于加缪来说，《局外人》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一个出发点。罗朗·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在195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局外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我说的第一不仅是时间上

的，也是质量上的）。这部1942年出版的小说在法国解放时期被所有的人争相传阅，很快为加缪赢得了荣誉；人们喜爱这本书，就像喜爱那些出现在历史的某些环节上的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任何人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都爱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部小说代表着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代表着被战争破坏的一个时代，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不合作的普遍心态。

“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以《论荒诞》为副题的《西绪福斯神话》则以哲学的语言论证了《局外人》的基本思想。所谓“荒诞哲学”，在加缪那里，是一个包括从觉醒（意识到荒诞）到行动（反抗荒诞）的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世界就是荒诞，人生就是幻灭，这样简单的概括不能反映加缪的荒诞哲学的全貌。加缪认为，荒诞感首先表现为对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起床，公共汽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公共汽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一旦有一天，人们对此提出了“为什么”，就悟到了荒诞。这种状态是千百万人最经常的状态，所以此论一出，立刻引起了共鸣，而且过了二十多年，人们又有了一个更简练的表达方式，即“地铁—工作—床铺”式的生活。人们对此感到厌倦，试图拒绝这种生活，这正是觉醒。他说：“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流放无

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因此，“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所谓共存，其表现形式正是人类社会。荒诞的存在，是以人为前提的，离开了人，荒诞也即消失。但是，认识至此并未完结，仅仅是迈开了第一步。荒诞，在加缪看来，仅仅是个出发点，重要的不是认识到荒诞，而是对荒诞采取什么态度，在荒诞的条件下人应该如何行动，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某种意义，从而获得某种幸福。可以说，加缪的全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如何对待荒诞的问题。他在评萨特的《恶心》的一篇文章中说：“对我来说，唯一的已知数是荒诞。问题在于如何走出去。……看到生命的荒诞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发现（荒诞），而是人从其中引出的结果和行动准则。”加缪的行动准则是挑战，是反抗，既要认识到理性的局限，又要“义无反顾地生活”。加缪把荒诞等同于笛卡尔的怀疑，以此为出发点，寻求建造人类的幸福。这种荒诞的英雄的典型就是西绪福斯。据希腊神话，西绪福斯被天神罚做苦役，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一到山顶，旋即滚落下来，他又得重新下山，再把巨石推上去，如此无休止地做着这种“无用且无望的工作”。加缪感兴趣的是下山途中的西绪福斯。“我看到这个人下山，朝着他不知道尽头的痛苦，脚步沉重而均匀。”正是在这个时候，西绪福斯觉醒了，知道了他的

悲惨命运，但是，“造成他的痛苦的明智同时也造就了他的胜利。”他敢于正视那块巨石，敢于再把它推上山顶，这是他在下山途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对命运的蔑视、挑战和反抗。所以，“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加缪称西绪福斯为天上的无产者，当代世界上工人的劳动无异于西绪福斯的苦役，西绪福斯的苦役象征着人类的命运，但是，加缪感兴趣的是西绪福斯的下山，是那种正视荒诞，战胜荒诞的精神，因此，《西绪福斯神话》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积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缪可以说：“我对人从不悲观，我悲观的是他的命运。”

12

1943年，抵抗组织实行合并，一年以后，加缪担任了《战斗报》驻全国抵抗运动的代表。巴黎解放之后，《战斗报》公开发行，加缪是主编之一。这时，加缪作为记者十分活跃，他为《战斗报》撰写了大部分社论，号召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支持西班牙共和派，要求执行更宽容的殖民地政策，特别着力鼓吹“集体经济和自由政治”。他全力支持戴高乐政府的国有化政策，要求在殖民地实行民主，指出“卡比里的农民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同样需要自由和正义”。他强烈要求惩处合作分子，把法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 1885—1970)的宽恕视为出卖。在国际方面，他主张欧洲实行先经济后政治的联盟。加缪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胆识和眼光使《战斗报》成为当时法国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吸引了大批优秀作家为报纸撰稿，同时也使他成为一代青年